

山东大学（威海）译学丛书

主 编 孙迎春

副主编 常晓梅

翻 译 研 究 新 探

New Investig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主 编：薄振杰

副主编：赵 薇 云 霞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山东大学（威海）译学丛书

主 编 孙迎春

副主编 常晓梅

翻 译 研 究 新 探

*New Investig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主 编 薄振杰

副主编 赵 薇 云 霞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CIP)数据

翻译研究新探 / 薄振杰主编.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4

(山东大学(威海)译学丛书)

ISBN 978-7-5309-5203-0

I. 翻... II. 薄... III. 翻译 - 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974 号

翻译研究新探

出 版 人 肖占鹏

主 编 薄振杰

责任编辑 袁 颖

封面设计 李瞻州

版式设计 杨学奎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丰利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印刷

规 格 32 开(880×1230 毫米)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12.75

书 号 ISBN 978-7-5309-5203-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薄振杰 1969年生于山东新泰。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英语系主任，山东大学翻译学博士研究生，山东省国外语言学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翻译理论研究、翻译与批评。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科技翻译》等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目前参加项目：山东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山东大学(威海)译学丛书

孙迎春 主编

- 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
- 语言类核心期刊译学论文索引
- 汉英对照翻译学论说
- 第二次大水——归、异翻译策略辩证
- 翻译研究新探

责任编辑 袁 颖

封面设计 李瞻州

版式设计 杨学奎

前 言

自人类开始拥有语言,尤其是文字以来,翻译作为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行为便从未中断过。中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册府元龟·外臣部》里记载的周武王时外族或外国前来朝贡的情况,那时,负责东、南、西、北各方来朝者翻译事务的译官分别叫做“寄、象、狄鞮和译”。(马祖毅,1984:2-5)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译论研究颇有成效。

中国传统译论从佛经译论、严复译论,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翻译理论,一直到傅雷、钱锺书的“神似”“化境”之说无不凝聚着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想结晶和话语特征,彰显着醇厚的人文魅力。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译论建设一方面享受着西方译论的开明之处,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正其风骨、充其底实,逐渐朝着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本论文集是山东大学(威海)译学丛书之五,内收论文50篇。文集分为三编:1. 专家论坛;2. 博士文丛;3. 硕士园地,内容涵盖笔译、口译、机器翻译研究,涉及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化学、符号学等等;论文作者都是认真做过翻译或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并重视理论研究的译学前辈以及正在攻读或已经取得翻译学硕士、博士学位的译学新军;所收文章均有创见或独到的体会,文章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理论水平较高,语言也大都明白流畅,文章后面的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

本论文集读者对象是从事各类翻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的翻译工作者和大、中学外语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各界外语自学者和翻译爱好者。

薄振杰

2007年10月26日

于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目 录

第一编 专家论坛

-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翻译 孙迎春 (1)
- 浅议大学英语本科翻译专业建设
——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王恩冕 (10)
- 翻译中的视点转移与视域融合 徐莉娜 (16)
- 本科翻译班文学翻译课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李绍明 (27)
- 英语专业本科生口译课教学计划的设计 刘秀芝 (35)
- 转喻与词典翻译 卢卫中 (45)
- 计算机辅助翻译:理念和工具 徐 彬 (55)

第二编 博士文丛

传统与引进:误导与误读

- 关于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现状的思考 尹衍桐 孙 欣 (67)
- 规范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文学之现代转型 薄振杰 (78)
- 翻译文化研究的新概念 任东升 王克友 (88)
- 翻译的“忠实”理念不可丢 王克友 (98)
- 目的文本取向的翻译研究
——G. Toury 与 H. Vermeer 的研究模式比较分析 孙昌坤 (110)
- 《诗经》翻译的难题与对策 李玉良 (119)
- 从译例词典到翻译语料库
——兼评《英汉翻译例句词典》 赵 巍 (131)
- 译学词典话语建构 范 敏 (138)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价值中立、方法多元与翻译批评 袁朝云 (143)

简论翻译家的国别归属	任东升 吕佳播(150)
目的与广告翻译	崔 英(157)

第三编 硕士园地

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翻译学	刘 华 张兰林(164)
中国第二次翻译高潮中译学理论的缺失	李 楠(181)
索绪尔语言符号观视角下直译和意译及翻译要素的整合	钟玉琴(187)
语篇翻译	
——语篇的解构与建构	冯 照(194)
浅谈英汉语义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秦玉卿(204)
浅谈功能翻译理论	魏倩倩(210)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幽默翻译	盛 娜(216)
多元系统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姜 茜(224)
接受环境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翻译	
——从中心翻译主体的角度阐释	齐明珍(230)
法汉对译中谚语的直译与意译	蔡 谨(236)
浅谈法语中的英语借词	王华芳(242)
谈翻译的标准与策略	魏 晶(247)
论口译的特点与标准	赵 薇(254)
跨文化背景下异化策略必要性探析	刘立胜(259)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归化与异化	刘长彩(265)
文学作品中双关语的翻译	刘 华(270)
从“对联”与“Couplet”互译看文化词的翻译	纪伟伟(277)
解析公司年报中长句的汉英翻译原则	常晶晶(282)
交际修辞——翻译中必不可少的手段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三个中译本的比较	苑晓敏(295)
地名译写 无须迷惘	郭红梅(307)
翻译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浅谈严复翻译中的两种精神	李 杰(315)
严复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梁 斌(321)
严复三字原则与泰特勒三原则之比较	任慧芳(326)

论庞德汉英诗歌翻译中的创译	张璐璐(333)
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理念的“实用型”转向	刘爱华(342)
翻译批评应该向文学批评学习什么? ——简要比较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二者的关系	赵娟娟(350)
翻译与艺术的相似性比较	云霞(358)
试从辞书释义的时效性要求论译学词典的规范性	何慧敏(366)
因特网辅助下的汉英翻译实践	赵 鹏(373)
从两部优秀译作看译者的语言功底	方科大(379)
从文化差异角度看语篇翻译	董 薇(384)
话语中的预设	孙萃英(390)

第一编 专家论坛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翻译

孙迎春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

摘要:本文结合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程,对一些耶稣会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活动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科学翻译的贡献和影响以及外汉科学词典编纂、科学译名的审定和统一等课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耶稣会士 科学翻译 双语科学词典 科学译名

1. 引言

从16世纪末开始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耶稣会士科学活动与中国近代的科学发展、科学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对传教士的看法不够全面,只看到一些卑劣传教士对中国不利的一面,而对另外一些传教士在科学上所做的牺牲和贡献估计不足。本人目前正在编写一本书,叫《科学词典译编研究》,涉及到这方面的历史,对这个问题有了较多的思考。

2.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程

2.1 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分期

中国近代的科学发展,是一个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的过程,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1) 明清之际的第一次移植(传入)。主角是来自西方的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为代表的传教士。他们出于传教的目的,把西方科学作为其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敲门砖。他们的努力无意间在中国社会播下了近代科学的种子,但由于遭逢中华帝国衰落的特殊境遇,这些拓荒者的工作竟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对科学的拒斥。

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有别于西方自然法观念。“道”“自然”“理”这些抽象观念所表述的世界基本秩序,是有机地内在于客观对象世界本身的,中国的哲学圣人认为它是人的理智难以认识的,因此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经验性与神秘感,而“缺乏原理和系统的内容”。这种观念不利于中国传统科学进化为近代科学。徐光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为改变这种观念提出了系统输入西洋科学的设想、计划,并尽力付诸实行。(罗冬阳)

接受西学,当时的学者有一种“拟同性解释”,就是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对西学进行同化性的理解和接纳。如李之藻所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往前推,在佛教初入中国的时候,有“老子化胡说”,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说”与之一脉相承。这是一种儒家文化中心观的自大心态。但在西学初入,反对者甚众的情况下,它毕竟是可以让人体面地接受西学的一种解释。(叶瑞昕)

(2) 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二次移植(引进)。主体变成有权有势的洋务派官僚,他们力主学习西方的科学以振兴中国的军事和国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强敌压境、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势下,中国社会上层开始了对西方近代科学的主动移植活动,即洋务引进活动。然而,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当时的有识之士更注重的是利用科学以“制夷”和“图强”这种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其他方面。

魏源(1794~1857)在《圣武记》中发挥了林则徐“悉夷”以“制夷”的思想,明确提出“师外洋之长技”的主张。冯桂芬(1809~1874),这位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目光比魏源更深远些,主张设翻译公所培养青年,从西方学术著作中“择其有理者而译之”,在他看来,“器”“技”之外的科学思想也很重要,因而不只提倡“师夷长技”,而且主张“师夷长学”。清朝末期一些“实力派”官员受魏源、冯桂芬思想的影响,在1864年之后纷纷走上“师夷长技”以求“自强”的道路。1865年他们在北京创设了同文馆,在上海虹口办起了赫赫有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同年,在南京开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创办马尾造船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移植的又一个高潮到来了。

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更加强烈的异体排斥反应。反对接

受西学的说法有两种,一种可称为“釜底抽薪之法”,即宣布传播者为名教罪人,其学自然无足可观。上层的权贵们用“道德”招牌来抵制“西学”,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动摇,下层的老百姓也以“破坏风水”等说不清的根由拒斥矿山的开掘和铁路的通行等。一句话,就是不能让“西学”泛滥成灾,搅乱我们社会的“纲常”和“秩序”。另一种是消极意义上的“西学中源说”,就是说现在输入的西学本是圣人当初所删削的部分,根本就不值得提倡。(叶瑞昕)在这种群情怨愤的背景下,同文馆事业和洋务运动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

(3)“五四”之后的第三次移植(体制化建设)。主角是留学回国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移植体制化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教育。

1919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到中国讲学,他批评中国的文化思想,其鼓吹的科学主义潮流席卷中国大地。与之相反,1920年同样到中国来演讲的罗素却极力称赞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认为它与西方大异其趣,自有其特点和价值。他希望两者在未来能够得以结合,从而生发出一种既尊重人的价值,又能肯定科学技术功能的新的文明价值体系。

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科玄论战,其产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和人文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成为严肃的文化问题。

一直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和文明的思想家梁启超,在目睹了欧洲战后的惨景后,把西方文明遭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归因于“科学的破产”,拼命攻击科学的作用。(梁启超,见夏晓虹:408~409)

1923年2月14日,张君勱在清华作“人生观”演讲,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有其自身的界限,力陈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别,并强调指出,惟其有此区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勱,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22~26)

地质学家丁文江立即予以猛烈反击,他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说“科学的目的是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识的真理。……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从这一核心理论基础出发,丁文江认为:科学能够应用于人生观;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不在科学,而在某些“不科学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丁文江,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72~73)

这场张、丁二人的争论,后被人称为“科玄论战”,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自从这场论战之后,西方科学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做是指导人

生和社会的万能武器,科学在中国社会变成了‘科学神’,人们崇拜它,信奉它,‘科学’成为重建中国文化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的新权威。”(李建军)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西学传入对我国学界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治学内容扩大了,开始由只注重经史之学,发展到注重自然科学;二是治学风气发生变化,开始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2.2 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结局

耶稣教传入日本的时候正值日本的战国时代,即日本封建割据的中世纪社会解体而进入近世统一国家的转折时期。它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宗教信仰、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方面,江户时期(1603~1867)产生了“兰学”。兰学是指江户中期至幕府末开国以前关于西方学问、技术或西欧形势的知识及其研究,当时主要以荷兰语为媒介进行学习,故称为“兰学”。汉文西方科技书也大量进入日本,中国系统的学术也成为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学基本持肯定、欢迎的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地翻译、宣传,对兰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相反,西学在中国的命运最终是衰微乃至消亡,因为统治者所关心的是西学能否为其稳定统治发挥作用。经过康熙帝与梅文鼎的精心阐释与发挥,“西学中源说”终于成为钦定的学术观点,丢掉了明末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中西以超胜”的目标,失去了全面学习、引进西学的机会,使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时无力抗争,只能任人宰割。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吸纳外来文化为己所用、发展自己的传统。对西方文化,尽管有怀疑、排斥的思想,但是最终进行了容纳。他们把西学与长久以来吸收利用的中国儒家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两种异质文化扬弃,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为“明治维新”和日本民族的崛起打好了制度上、科学上和思想上的基础。这是令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值得思考的。(胡孝德 & 高小平)

3. 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与近代双语词典滥觞

3.1 耶稣会士科学活动的成果

无论如何,西方科技文献在我国得到了传播,所涉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在数学方面,1607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1856年英人韦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首次引进了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它的逻辑推理求证的科学方法,恰恰弥补了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不足。1859年,韦烈亚力和李善兰合译《代微积拾级》(18卷),首次

引进了微积分。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和艾儒略著的《职方外纪》,首次将地圆说和五大洲等世界地理概念输入了进来。利玛窦等人使用的经纬度测量法,它的传入开了中国以科学之法绘制地图之先河。清康熙年间测量、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即是欧洲地理学传入后的一大成果。另外,在物理学、医学、水利、炮兵训练、火炮制造、天文历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多建树。(潘玉田 & 王固生)

3.2 近代双语词典滥觞

16 世纪末,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始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著名学者利玛窦。1582 年(明万历十年),利玛窦随葡萄牙商队来到澳门。面对泱泱中华帝国,传教士首先面临的是语言不相通的窘境。为了生存、传教,他们开始了研究中西文字、编纂词典的艰辛劳动。

利玛窦与罗明坚(P. Michel Ruggieri, 意大利人)合作编出耶稣会士编纂的第一部双语词典——《平常问答词意》(Dizionario Portoghese-Chinese),这是一部葡华、华葡词典,依照字母顺序排列,首创用拉丁文拼出汉字读音之法。手抄本现藏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对中国文字学和辞书编纂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利玛窦又与郭居敬(L. Cattaneo)合编了《西文拼音华语字典》(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 more coreinnatum, et per accentus suos digestum)。这些都是稿本,并未付梓。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利玛窦独力编出《西字奇迹》一卷,列声母 26,韵母 43,次音 4,声调符号 5,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利玛窦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由这个非常汉化的名字,映射着他(和许多其他东来传教士)的一个强烈愿望:立足东土,干一番事业。他通过讲学、谈话和拜访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试图发展教徒,并从 1592 年起放弃僧服改着儒装,引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1601 年初“到北京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主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玻璃柱等上贡。神宗‘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明史·意大利传》)。这样,他就在京城获得立足之地,建立了教堂,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他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还第一次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先河,他又第一个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注音,并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他在北京住了 10 年,于 1610 年 5 月 11 日病逝,“御赐祭葬,墓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圣教信征》)。(马祖毅,1999:440-1)

清朝定鼎北京以后,耶稣会士编纂的双语词典除上述者外主要还有:“比利时金尼阁(N. Trigault)编的《西儒耳目资》,门采尔撰 Sylloge Minutiarum Lex-

ici Latino-Sinico Characteristici (汉文书名为《拉丁汉文小字汇》);白晋(P. Joach Bonvet)撰《中法字典》;孙璋(A. de La Charme)撰《汉蒙法对照字典》;魏继晋(P. Florian Bahr)撰《德华字典》等。”(康志杰)他们的这种双语实践行为,可以说是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双语词典编纂之先河,功不可没,光照日月。

4. 中国科学翻译与外汉科学词典编纂

4.1 外汉科学词典

就已有资料来看,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外汉科学词典是1842年法国人加略利(Joseph Gaetan Pierre Marie Callery)编的《汉语百科辞典》(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其后,在早期科学翻译高潮中问世的科学词典还有:1858年,英国传教医师合信编《医学英华字释》(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1864年,英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英华行篋便览》;1872年前(约),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编《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1885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等等,琳琅满目。

4.2 科技刊物

清末,随着传播科学知识的需要,虽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大量翻译机构译印科学书籍,但是译印书籍花费时间较长,同时,译书不能满足读者对于国外最新科技、政治及经济等信息的需求。于是,及时刊载最近信息的科技刊物便应运而生。其中主要的有:《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月刊,1857年1月于上海创刊;《中西闻见录》,1872年8月于北京创刊;《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周刊,1868年9月于上海创刊;《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月刊、季刊,1876年于上海创刊;《时务报》(The Chinese Progress),旬刊,1896年8月于上海创刊;《经世报》,旬刊,1897年于杭州创刊;《萃报》,周刊,1897年8月于上海创刊;《实学报》,旬刊,1897年8月于上海创刊;《新学报》(Sin Hsioh Pao),半月刊,1897年8月于上海创刊;《求是报》(International Review),旬刊,1897年9月于上海创刊;《译书公会报》(The Translation Society Weekly Edition),周刊,1897年10月创刊;《岭学报》(Chinese Students Review),旬刊,1898年2月于广州创刊;《渝报》,旬刊,1897年10月于重庆创刊;《国闻汇编》(The Light Seeker),旬刊,1897年12月于天津创刊;《利济学堂报》,半月刊,1897年1月于温州创刊;《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五日刊、旬刊、半月刊,1897年于澳门创刊;《农学报》,半月刊、旬刊,1897年5月于上海创刊;《昌言报》,旬刊,1898年8月由原《时务报》易名续办;《工商学

报》，月逢2、9、16、23日发行，1898年9月于上海创刊；《湖南商务报》，旬刊，1898年4月于武昌创刊；《励学译编》(The Translatory Magazine)，月刊，1901年4月于苏州创刊；《江南商务报》，旬刊，1900年3月于上海创刊；《译书汇编》(The Yi Shu Hui Pien)，月刊，1900年12月于日本东京创刊；《教育世界》，半月刊，1901年5月于上海创刊；《翻译世界》，月刊，1902年12月于上海创刊；《外交报》，旬刊，1902年1月创刊，上海外交报馆编辑，普通书堂发行；《游学译编》，月刊，1902年2月创刊，东京游学译编社编辑，东京出版，长沙矿务总局发行；《富强报》，五日刊，1897年5月于上海创刊；《尚贤堂月报》，月刊，1897年6月创刊，于北京出版，主编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 1827~1916)，自第3期更名为《新学报》。

4.3 科学译名的审定和统一

传教士编纂词典，多出在中国传教的需要，他们是以编词典的形式，帮助自己克服语言障碍，达到传教之目的。自清末科学翻译高潮时期始，各学科文献的翻译不断增多，民间与政府翻译机构顺应形势，开始编纂出版一些外汉对照名词词表与外汉专科词典，同时着手探索科学术语、人名及地名等译名统一的原则。“当时制订的一些译名统一原则多属草创，科学性及实用性尚嫌不足，加上清政府已岌岌可危，根本未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统一组织管理及宣传推广，因此制订的词表词典在当时的翻译活动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黎难秋：1998)

科学译名的审定和统一工作，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学术行为，也是与外汉科学词典编纂密不可分的基础性工作。民国初期，译名统一这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是由学术团体启动，而后引起政府部门重视的。这方面的史料很多，以下摘要介绍一些以作豹斑之窥：

1915年10月，留欧学生赵元任、任鸿隽、胡明复等发起组成中国科学社。其《社章》第三条内容是：“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中国科学社出版有月刊《科学》(1915~1950)。中国科学社成立于民国初期，是我国早年最有影响的学术团体。成立伊始，即宣言欲开创审定译名之基业。1916年设名词讨论会，结果在《科学》上发表。

1916年，教育部设立译名委员会，从事学术名词编订工作。

1923年7月，中国科学社成立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席为姜立夫，委员有何鲁、胡明复等。同年，南通大学冯肇传撰写论文《遗传学名词之商榷》，载于中国科学社月刊《科学》的第8卷第7期。系作者与冯锐、王璋、陈宰均及唐载均等对遗传学译名进行研讨修订的结果，对651个译名进行了统一。

1932年,南京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将编订译名列入计划。一则其为国立机构,对译名所做的编订、统一、推广具权威性;二则其下的译名委员会设有各学科组,人员、经费有保障,故在众多民间学会、协会的译名审定委员会中很有影响力。

1934年10月24日,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在上海成立,将审定和统一电工名词作为学会的一项任务,并于第一届董事会上筹组了电工名词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又与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设立了普通、电力、电信与电化四个专业组,分别对各类名词进行搜集、整理、审议和定名。1937年~1945年间,他们审定的名词曾由教育部公布,共计有17564个。

自国立编译馆成立后,该馆译名委员会各学科组与各学会、协会下设的译名审定组织密切配合,为我国的译名审定做出了大量成绩。(黎难秋:1998)

5. 结语

应当说,中国近代的科技发展、东西交流、双语词典编纂等,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传教士中当然有劣迹斑斑,乃至恶贯满盈者,但他们并不是浑然一体、完全同质的。对利玛窦、汤若望、白晋等众多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人,我们永远不可忘怀。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建构新的科学价值观体系。现在没有人再把科学看作“洪水猛兽”或“雕虫小技”了。我们在重视科学的同时,万不可随心所欲地把科学当作自己的工具,与科学精神相违背,亦不可盲目拜科学为至高无上的神。我们所要做的是,始终如一地在体制化上下工夫,致力于建立非片面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合乎科学规律的科研体制和与人类根本利益一致的现代化的开发体制。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胡孝德 高小平.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结局.中州学刊. 2000 (3).
- [2] 黎难秋.民国时期科学译名审订概述.中国科技翻译. 1998 (2).
- [3] 李建军.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科学价值观. www.nethzz.com/phil/data/13333.html
- [4] 李亚舒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 [5] 罗冬阳.论明末清初西学的分期与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 4.
- [6] 潘玉田 王固生.明清时期西方科技文献在我国的传播与影响.固原师